

谈谈中国哲学的特殊性

李存山

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中国哲学的特点、如何弄清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及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关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梁启超曾说：“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伦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而中国哲学主要研究“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直译的 philosophy，其涵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借用，只能在上头加上个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在这里，梁启超实际上指出了中西哲学各有所长。

中西哲学虽然都起源于公元前 500 年前后，但所处的社会背景很不相同。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古希腊哲学是“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是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与此不同，中国的先秦哲学是起源于对人生、对社会的忧患，先秦诸子没有生活的“闲暇”，而是大多“席不暇暖”地周游列国，以谋求从“天下无道”转变为“天下有道”。司马迁说：先秦六家都是“务为治者也”。他们的言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务为治”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人生的安顿、社会的治理而提出各种学说。在先秦诸子“究天人之际”的普遍模式中，都把“知人”、“为治”作为中心和宗旨。这是先秦哲学不同于古希腊哲学的一大特点。

西方现代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世界历史“轴心时期”的理论。他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把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并列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又把老子列入“原创性形而上学家”。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是有启发意义的。

在中国上古时期就有了“知人则哲，安民则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是以温和的方式，即对中国上古文化既有继承又有突破的方式来实现的。与古希腊“以智力为基点的人文主义”不同，孔子所建立的思想范式以“仁者爱人”、“智者知人”为中心，这可以说是一种“道德性的人文主义”。中国的“天人之学”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以“天道”为心性论和价值观的根据，其所明“人事”的宗旨就是“立人极”，也就是要确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因此，价值观是中国哲学的核心。

与佛陀和耶稣所建立的宗教思想范式不同，中国哲学的精神是“道不远人”，“极高明而道中庸”，“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因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国学的核心价值。在这种价值观中，包含了对天地万物、生活世界之实在性的肯定，中华民族就是要在这个实在的生活世界中自强不息地追求和实现人生与社会的理想，以人为本，崇尚道德与和谐、宽容博大、生生日新。这种哲学精神就使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它也是中国哲学在参与世界哲学的对话中具有的优势资源。

学术随笔

研究《老子》的一部新作

——评《老子道德经新编》

朱有志



董京泉所著的《老子道德经新编》，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老子《道德经》的思想内涵和内在逻辑，对原有文本进行了重构，将其分为道论篇、德论篇、修身篇和治国篇，使老子的思想观点更为集中、脉络更为清晰。该书有两大特点：

富有理论创造性。该书各章在原文、注释、译文、述评之外，特设“辨析”一栏，对各章思想主旨和各个难点特别是古今注家认识分歧较大的一些问题，一一详加分析考辨，并通过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是作者用力最大的部分，也是全书最精彩、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

善于进行理论概括。作者认为，作为哲学范畴的“道”，是既超越又内在于天地万物及社会人生的形而上的存在本体和价值本体，它的实质是矛盾法则或对立统一规律，对立面的协调和谐或转化是其落脚点。自然无为是道的根本特性，在价值观上道是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社会人生问题是老子关注和论述的中心，“推道明人”和“内圣外王”是老子重要的思维方式，亦是老子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逻辑。作者将老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归纳为以形而上的道为根本依据、以自然无为为纲纪、以依道修身为中介、以治国安民为归宿的理论大厦。

新书架

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

王 杰

中国传统哲学是相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而言的。学术界一般把公元前 11 世纪的殷周时期，也就是传说周文王推演《周易》的时期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哲学称为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起着主导作用。黑格尔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今天，人们关注中国传统哲学，是期望能从中得到新的启示。

发展脉络

现在一般把中国传统哲学划分为七个阶段，即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乾嘉朴学。

先秦子学。先秦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如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形成了众多思想流派，其中最有影响的当属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先秦哲学探讨的重点侧重于政治、伦理、道德、人生等问题。可以说，先秦子学奠定了中国哲学的基础，掀起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两汉经学。汉代统治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终于在汉武帝时期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此，儒家思想始定于一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思想。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用了大约近 400 年时间。此外，在汉代，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这是外来文化第一次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触。汉代的主要哲学家有董仲舒、王充等。

魏晋玄学。魏晋时期，一反两汉时期繁琐的经学及神学目的论，尊崇老子、庄子及《周易》，号称“三玄”。这一时期，在思想上和思维方式上出现了一次大的解放。魏晋玄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一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二是本与末、有与无、动与静、一与多的关

系；三是语言和思想的关系；四是肉体和精神的关系。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弼、裴■、欧阳建、郭象、范缜等。魏晋时期，道教、佛教思想也在兴起，儒释道三教首次处于三足鼎立、势均力敌阶段。

隋唐佛学。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碰撞与融合，至隋唐时期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形成了众多的佛教流派。在隋唐佛教诸宗派中，禅宗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典范。隋唐佛学探讨的中心议题之一是佛性问题，也就是心性论问题，内容包括人的心理活动、感觉经验、道德观、社会观、认识论以及宗教实践等。

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糅合了释、道两家思想而创立的一种新的哲学形态。这是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 700 年的指导思想。宋明理学主要有程朱（程颢、程颐、朱熹）理学、陆王（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和张王（张载、王夫之）气学三大流派。宋明理学探讨的内容和范围十分广泛，如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心性论、知行观、修养论、境界论等。

明清实学。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大都反对宋明理学，把理学看作是虚学。明清实学反对空谈心性，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封建专制，提倡思想解放，因而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性质。实学思潮遍及当时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主要代表人物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

乾嘉朴学。清王朝建立后，开始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人们不敢再谈论政治，因而转向了训诂考据。朴学以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少理论发挥，也称乾嘉汉学、乾嘉考据学。乾嘉朴学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就是对传统的文字学、



春花烂漫率马观。

乔启明摄(人民图片)

学术动态

本版责任编辑：吴 珺 何民捷 苏 超
电子信箱：lilunbu@peopledaily.com.cn

“人文北京”论坛提出

建设充满人文氛围的和谐美好城市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市社科联举办的“人文北京”论坛最近在京举行。本次论坛是“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系列论坛的首届论坛。

与会的专家学者指出，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是对北京奥运会所取得成果的巩固和扩大。在建设人文北京的过程中，应当彰显北京的特色和优势。对此，专家们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力度，形成供市民从事文

化休闲活动的新的文化中心，以满足普通民众的精神文化需要，让普通民众在轻松享受文化生活的同时得到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熏陶。二是提倡学习风气，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各国优秀文明成果，提高市民的整体素质。三是充分发挥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的优势，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将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四是大力倡导尊重人、关怀人的社会风尚，把北京建设成为充满浓郁人文氛围的和谐美好城市。

（许 星）

《高放学术思想评论集》

《高放学术思想评论集》近日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共收录 101 篇专家学者对高放学术思想的评论。在体例上，按其研究领域分为：一、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篇；二、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篇；三、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篇；四、教书育人与学术风格篇；五、一些学术思想采访录。该书对高放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概括与分析，并辑录了高放的学校领导、同行专家、学生及新闻媒体对高放学术思想与成就的评价。

（韩 冰）

《生态文明传播教育》

张玉林编著的《生态文明传播·现代环境宣传教育》(中国经济出版社)一书,是一部环境宣传教育的理论专著,同时也是一部生态文明传播的科普读物。

该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对现代环境宣传教育的概念、意义、内容等进行了阐述。作者提出,环境宣传教育是生态文明传播的重要途径,全民都是环境宣传教育的对象,多种多样的活动和项目是环境宣传教育的重要方式。作者还列举了大量环境宣传教育活动实例,增强了该书的引导性和可读性。

（周纪鸿）

“气候变化的科学与经济问题”研讨会提出

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办、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承办的“气候变化的科学与经济问题”交叉学科专题研讨会近日在京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交流。

与会者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环境问题，成为一个环境、技术、经济、政治、法律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战略问题。相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介入气候变化研究领域较晚。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对气候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谈判经验的不断积累，

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国家气候问题决策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气候变化的科学与经济问题研究方面，科学研究是基础，社会经济分析是手段，为国家决策服务是落脚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进一步加强在该领域的合作与交流，紧密结合国际发展动态，面向国内现实政策需求，联手推出一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共同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王 迎）

“WTO 法与中国”论坛强调

提高参与制定全球经济规则的能力

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主办、福建省国际法学会承办的“WTO 法与中国”论坛不久前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

与会者指出，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贸易大国。当前，面临新的世界经济局势，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手段，是否善于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将日益成为能否有效处理国际经济贸易问题的关键。针对目

前国际上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我国应积极地通过世贸组织处理有关贸易纠纷与摩擦，运用不断增强的对外贸易实力来维护我国的经济、贸易利益。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我国遵守、运用、参与制定全球贸易与经济规则的能力，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构筑和创新我国从世界贸易大国向世界贸易强国发展的新型对外贸易法律体系。

（沈厚铎）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爆发

「《资本论》《帝国主义论》与当前西方金融危机」学术研讨会认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主办的“《资本论》、《帝国主义论》与当前西方金融危机”学术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

与会者认为，虽然《资本论》、《帝国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有上百年或近百年历史，但其关于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具有双重作用的分析，仍然符合当今的实际情况。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进入新的阶段，一方面生产社会化突飞猛进，各企业、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另一方面，垄断资本的

利益进一步加强，自由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加剧，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不断加深。美国的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甚至相互脱节，是导致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与会者强调，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所有制的多元化等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宏观调控的难度，我们要

（朱佩娴）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需处理好几个关系

「危机与改革形势分析会」提出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最近在京举办“危机与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就如何认识和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讨论。

与会者提出，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需要着力处理好几个关系。

（苗树彬 梅东海）